

# 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危机与主体视域

马汉广

---

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意识,无论源于外在语境还是自身学科理论建设的问题,都和我们在学理上没有界定出它的独特内涵和学科定位有关。而比较文学学科的独特规定性和内涵,核心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即主体和视域,合起来可以称作主体视域。本文反思这个学科的危机所在,并对主体和视域问题做出思考。

---

—

大概从来没有哪个学科像比较文学学科一样,既表现出了方兴未艾的巨大生命力,又时刻面临着危机。回想一下比较文学的历史,自从 1827 年维尔曼在巴黎大学讲学时首次提出了“比较文学”这个名称以来,首先是法国学派在 19 世纪末一直到 20 世纪中期的兴盛,接下来是美国学派 20 世纪中期的异军突起,再后来出现的苏俄学派以及中国学派的构想等等。时至今日,比较文学学会仍是会员最多的学会之一,比较文学的会议也是参加人数最多和成分最庞杂的会议。然而这个学科的发展也始终伴随着一种危机意识,正像希利斯·米勒所说的:“比较文学却总是处在危机中,作为一门学科,它就被特别设计成一个激烈的载体,包含了文学研究中永远的危机。”首先是 20 世纪初对这个学科的合理性的质疑,如克罗齐就提出:看不出比较文学有成为一个学科的可能。其次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标志,针对法国学派把比较文学理解为“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狭隘观念以及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沙文主义立场,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美国学派就是由此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20 世纪末期,由于文艺理论的发展侵占了过去属于比较文学的领域,从而导致一些理论家深感危机,雷马克、韦勒克、韦斯坦因等资深学者都纷纷著文对文艺理论的无限扩张进行回击。到了本世纪初期,几乎前后相继,先是希利斯·米勒在中国的几所大学中做了《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的讲演,提出比

---

希利斯·米勒:《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李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5 页。

较文学的危机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语言;二是新的传播介质。接下来是斯皮瓦克出版了《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提出比较文学因为其跨界的单方面渗透性,和欧美中心主义的思想意识而陷入了死亡的境地,并提出她的所谓新的比较文学观念,即与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结合起来的比较文学。

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形,外在的原因也当受瞩目。外在的原因即是指由于现实语境的种种变化对其提出的挑战,以及文学研究诸学科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其有新的要求。就当下情形来说,后现代语境、全球化语境都对比较文学学科发展提出了挑战。希利斯·米勒之所以提出“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问题,就是站在解构主义立场上对传统比较文学的发难。斯皮瓦克则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从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倡导文化多元共存的角度切入的。正像孙景尧、张骏萍所言:“斯皮瓦克认为,全球化的本质乃是西方中心主义。在经济层面,全球化是‘将全世界的乡下穷人都集合到同一种金融法则之下,集合到同一个由国际几大统治力量所操纵的全球资本之下’。在文化层面,全球化是一种趋同的倾向,它尊崇西方主流文化,却忽视边缘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都同成为世界主流语言、话语权语言和‘最大赢家’的‘全球英语’(global English)有关。”

然而在他们的发难之中似乎都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主体立场问题,他们都反对对强势的西方文化的简单认同,和接受其单方面的渗透,但得出的结论却不同。希利斯·米勒“建议发展一种全球性、非欧洲中心化的比较文学”,而这个所谓的全球性、非欧洲中心化的比较文学首先是研究具体作品时“应该学习相关的语言”,通过语言的习得来把握所研究国的文学。这就把比较文学等同于世界文学,也就是我们现在学校里开设的外国文学课,也就取消了比较文学自身的学科特性。斯皮瓦克显得比米勒要开明多了,她提出比较文学必须要和区域研究联系在一起,为比较文学研究指出了一条改变西方中心主义的道路,但这条路能走多远尚在尝试之中。

此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新的综合趋势对比较文学的挑战,其中主要是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发展对比较文学影响较大。这种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这些学科的发展侵占了过去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文学理论研究出现了一种批评化的趋向,即通过讨论具体作品,或者是创作所谓虚构式的理论小说来阐述理论问题。马克·柯里在谈虚构的理论小说时曾列举了罗兰·巴特、戴维·洛奇、乌姆贝托·艾柯和克莉斯蒂娃为例,并引用了后者的一段话:“想象力可以被认为是概念和概念体系的深层结构。也许象征的会聚地是与激情相关的那个能指基础。所谓能指,即感觉、知觉、情感。将它们进行转换就是离开概念之域而走向虚构之域:因此,我已与充满激情的智性生活挂上钩了。”这种与感性的、激情生活挂上钩的理论形式过去应该是属于比较文学的,尤其是那种汪洋恣肆、不拘一格、古今中外作品信手拈来的研究方式。文化研究的兴起最早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之中已逐渐跨越了狭隘的界限,变得无所不包了。它可以渗透或者说融进任何一个学科,甚至是任何一个问题、任何一个领域,比如政治文化、影视文化、大众文化、宗教文化,乃至酒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文学研究这样一个学科领域自然也不例外。文学中的文化研究既突破了国别、民族、语言的界限,也突破了学科的界限,几乎把比较文学的领域包容殆尽,所以许多学术文章或者专著,我们简直说不清究竟属于哪个学科了,比如像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问题》,和上文提到的米勒的《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等等。

其次是在研究方法上,可以说 20 世纪中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具有一种新的综合趋向,几乎完全打破了学科之间的界限,熔哲学、宗教、历史、文学于一炉,实现了一种新的整合。尤其是各门学科出现的“泛语言”化倾向,“在泛化的语言中,蕴含了整体的文化元素。换句话说,20 世

孙景尧、张骏萍:《垂死之由,新生之路》,载《中国比较文学》2007 年第 3 期。

希利斯·米勒:《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第 88 页。

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9 页。

纪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发生了整合,这一点我们从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最终引出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普罗普的结构神话学、弗莱的原型理论等,这一过程可以得到明确的印象”。在这种研究语境之中,似乎一切都成为了一种泛文化的问题,一切研究都成了一种泛文化的研究,人们找不到过去在传统学术研究中可以确定为某一学科的问题和研究方法。比较文学本身也成为了一种泛文化的研究,和其他学科之间已经很难区分。尤其是许多从事文化批判以及文论研究的知名学者,本人就是比较文学系或比较文学专业的教授。所以比较文学与文论研究和文化研究严重重合,这同样对比较文学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以上种种外部因素对比较文学的影响,矛头都是指向比较文学自身的理论建设的,也即作为曾为人们欢欣鼓舞的一种文学研究范式,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认知体系,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方法如何?这不能不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关于这个学科的定义及对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方法的界定。

最早为比较文学提出界定的应该是法国学派,第一个全面系统地定义比较文学的是梵·第根,而最典型的是伽列为他的学生基亚的《比较文学》一书作序时提出的:“比较文学的定义有必要再一次加以廓清……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在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与维尼之间,在属于一种以上文学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构思以至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间所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是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那种发展演变。”

人们曾经评价这是一个典型的法国学派的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在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学派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严密的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并赋予了它固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方法。从实证主义思想基础出发,对不同国别、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作家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研究,并且要以事实联系为依据。这种研究是只考虑作家与作品之间的事实联系,而根本不考虑作家作品的美学价值。基亚说得更明白了,比较文学的正确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应该说,如果不考虑后来美国学派对其发难,法国学派关于比较文学的界定,从研究对象到研究的方式方法都是最具体、最明晰、最能保证学科体系的严密性和最容易把握的,操作起来也殊少异议的,确实达到了这个学科的自我独立性。但将比较文学仅限定在影响研究上,的确有文化沙文主义的气息,因为这种研究中暗含着民族文化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以及追根溯源寻找外来文化影响的痕迹。对历史悠久、处于强势的文化来说,这种研究就成为一门非常有趣的和极其必要的学科,并可以产生某种民族的优越感。但对于历史较为短暂的,处于弱势的文化来说,这种研究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或者成为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一种反讽。

20世纪50年代末,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对比较文学仅局限于影响研究提出质疑,强调比较文学研究要注重“文学性”问题,这是文学艺术的本质所在。这也就是说,比较文学研究不能只关注某种事实联系的东西,不能只搞实证主义的“杂碎”,而应该开拓出美学和文学性研究的领域,这就是人们所谓平行研究的开始。雷马克很好地概括了美国学派关于比较文学的界定:“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美国学派以平行研究取代影响研究,或者说是使两种研究齐头并进。第一,从对象上说,突破了事实性联系的局限,将“文学性”作为比较研究的核心,从而进入到对文学

王志耕:《比较文学:走向现代文论与文化研究》,载《中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伽列:《比较文学初版序》,李清安译,《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2—43页。

基亚:《比较文学·前言》,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张隆溪译,《比较文学研究资料》,第1页。

的内容和艺术的分析之中。第二,从方法上说,摆脱了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突破了考据、索隐局限于因果关系的“实证主义的杂碎”,从而把比较文学提升到美学价值判断和艺术性的研究层次。第三,从学科研究范围来说,突破了法国学派搞纯文学研究的限制,突出了对文学与其他人类精神领域的关系的研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跨学科研究。

美国学派极大地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改正了法国学派过于狭隘、带有文化沙文主义的学科定位。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即这个学科仿佛被无限扩大,包容的太多,因而使得这个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界限模糊,在操作上也不容易把握了。雷马克批评法国学派的狭隘说了这样一番话:“法国比较文学否定‘纯粹’的比较,它忠实于 19 世纪实证主义学术研究的传统,即实证主义所坚持并热切期望的文学研究的‘科学性’。按照这种观点,纯粹的类比是武断的、偶然的和主观的;这种类比不会得出任何结论,尤其是不能得出有更大意义的、系统的、概括性的结论……既然值得尊重的科学必须致力于因果关系的探索,而比较文学又必须具有科学性,因此,比较文学应该研究因果关系,即影响、交流、变更等。”这话在批评法国学派时的确切中要害,但同时也揭示了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界定的问题所在,那就是把当时所有无法归入到文学研究其他学科的任何范围和领域几乎都归入到比较文学的范围内,从而取消了这个学科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只是当时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还没有出现类似文化研究这样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所以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还没有显露出来。

其后关于比较文学的界定,可以说都是围绕着这条思路和逻辑进行的,只是包容的内容和范围更广了,诸如被称为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的界定,四个跨越:即跨越民族界限、跨越语言界限、跨越文化界限、跨越学科界限。这是一个以无限扩大范围来应对危机的做法,“从最初的不同国家间的文学关系研究(法国学派)到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直到近年来国内外盛行的‘跨国别、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跨文明……’云云。这可以无限地跨下去,直到无所不包”。然而通过无限制地扩大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做法来应对危机,不仅不能真正消除危机,相反只能使学科的界限愈益模糊,最终则导致这个学科与其他学科混淆不清。如此,才有“比较玄学”和“比较大学”的感慨。

## 二

有人主张我们应该缩小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确定研究对象,把真正属于比较文学的还给比较文学,而把属于其他学科的东西也还给其他学科。如通过区分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在退守中求得出路,也有人主张回归到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定义上,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法国学派。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与前文所提及的属于同一思路和同一逻辑,都是仅靠为比较文学划定范围来确定这个学科的定位,却不能说清比较文学究竟是什么。更多的人意识到,仅仅靠扩大或缩小学科的研究范围来解决比较文学的危机,这是认识论上的一种无限循环,也许能暂时性地缓解危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比较文学的问题。必须在学理上对比较文学做出科学的界定,找到真正属于这个学科的独特规定性和深层蕴涵。

近几年学者纷纷撰文,如乐黛云《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刘象愚《比较文学的不变与变》,孙景尧《拷问:比较文学是什么?比较文学“研究”是什么?》,王宁《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全球本土化”历程及其走向》,杨乃乔《比较视域与比较文学本体论的承诺》等文

雷马克:《十字路口的比较文学:诊断、治疗和预测》,郭建译,《比较文学研究资料》,第 67—68 页。

方汉文:《比较文学学科永恒危机的逾越》,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 年第 2 期。

孙景尧:《比较文学,还是比较玄学?》,载《中南大学学报》2004 年第 3 期。

参见王志耕《比较文学:在退守中求得生机》,载《中国比较文学》2006 年第 1 期。

参见钟华《比较文学危机及出路之我见》,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



章,对在新形势下的比较文学学科应该如何发展,这个学科的内在规定性是什么等问题,表达了看法。总结诸文要点,从学理上定位比较文学,其核心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谁来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怎样研究比较文学。后者我们称之为“视域”问题,前者我们称之为“主体”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又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所以可以合起来称为“主体视域”,或者叫主体的比较视域问题。杨乃乔认为比较文学与国别文学及民族文学的根本差异,就在于后者学科身份能否成立在于研究客体的定位,而比较文学学科身份能否成立在于研究主体的定位,并认为比较视域是比较文学赖以安身立命的本体,这是笔者非常赞同的,但对于主体和视域的定位,或者说比较文学的主体视域究竟应该怎样界定,它有怎样的内涵,仍有未尽之意,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第一,视域问题。简单地说“视域”,也就是视野,眼界。即我们如何来看待用以比较的不同文学的问题。这是一个越界的问题,所以人们多将跨越性看作是视域的基本内涵。“只有那些跨越了民族界限、文化体系界限和学科界限的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才能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不具备跨越性的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便不是它的研究对象”。“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研究主体以‘四个跨越’为比较视域的内涵,把‘三种关系’作为研究客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跨越是一个视域的问题,但不应该成为视域的全部,如果说比较视域就是一个跨越性的问题,即只要超越了民族、语言、文化、学科界限就万事大吉了,那比较文学也的确没有多少存在的必要了。因为我们前文提到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都已经超越了这些界限来研究文学问题了。所以,我们既承认这种跨越性,又得研究如何跨越,而后者是比前者更重要的问题。

如何跨越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怎样去看待不同的文化与不同的文学的问题。过去人们只强调知识装备的问题,如我们必须熟悉两种以上的语言,熟悉两种以上的文化传统,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学贯中西、学贯古今,具有较为丰富的学识素养才行。言下之意,比较文学研究似乎对研究者在学识上有更高的要求,却很少有人谈到我们的独特的眼光的问题,因为虽然我们熟悉了两种或多种不同的语言,也熟悉了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文化,但我们总是站在一个特定的立场上去对待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总是带着独特的价值判断来得出结论。这样在研究之中就难免会出现类似“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的观点。福柯在谈论启蒙问题时所讲的“拒绝对启蒙的敲诈”,也就是必须跳出停留在理性的立场上赞成启蒙,或是站在反理性或非理性的立场来反对启蒙这样一个非此即彼的立场,对我们谈论比较文学的视域问题是有一定的启示的。我们的视域也必须是跳出对两种或多种文学做价值判断的简单立场,没有先入之见,公平公正地对待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学。

说到公平和公正,做起来很难。第一,每一个人都属于一个特定的民族,都属于一个独特的文化传统,其他民族文化对于他来说都是异质文化,是一个“他者”,因而在对不同民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时,其本民族文化传统就会不知不觉地影响了研究者的观点,所以首先要实现比较视域的双重超越。所谓双重超越,就是既要超越宗主国的文化立场,也要超越所比较的他国文化立场。这里所说的超越,不是把文学完全变成没有文化土壤的无本之木,而是要超越简单的价值判断的立场,超越总是要追问孰优孰劣的深层观念,不要总是把借鉴、参照之类的观念置于自己的研究实践之首,寻找可以为我所用的东西,而是对于所研究的不同文化与文学,力求融入其中,在既超越自己民族文化视野和立场,也超越对方的文化视野和立场的情形下,对所比较的两种或多种文化传统作本体的研究。所谓本体的研究,也就是要求研究者能够进入到这种文化的内部,把自己真正融入其中,而进行一种内在透视。

这种双重的超越,对于研究者来说,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即从开始把两种文化都当作异质

参见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杨乃乔《比较视域与比较文学本体论的承诺》,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5期。

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第109页。

参见福柯《何为启蒙?》,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

文化和“他者”，到最后自己融入其中，对其做内部透视。这时我们所说的“异质文化”、“他者”，则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指比较研究中不同的文学与文化互为异质文化，互为他者，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主次之别，更不能把这种观念代入我们的研究实践之中。

第二，文化霸权观念的影响。不仅强势文化有霸权意识，如西方中心主义；弱势文化也同样存在着某种霸权意识，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谓“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同样会成为一种霸权意识而影响着人们的观念。要避免霸权意识的影响，我们就必须建立起一种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化的观念。所谓世界文学与文化观念，不是说全世界没有了民族、地域的差别，而建立起了一种统一的、属于全人类的文学和文化，而是恰恰相反，在承认各民族文学和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强调文化价值的多元共存。

世界文化是一个大家庭，它是由不同的民族文化共生共存而形成的共同体，在这里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是这一合唱中的一员，都有自己存在的依据，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这里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只是大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形下担负着各自不同的任务，起着不同的作用。我们应该看到不同民族文化争取自身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合理性，也应该充分尊重他们的这种合理性。他们之间的相互碰撞、交流、沟通、融合，才构成了世界文化的多极性和开放性，才使得世界文化真正具有创新性。以霸权意识来对待其他文化，以文明冲突来否定某种文化存在的合理性的作法是极端错误的。近些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多起局部冲突乃至战争状态，向我们展示了这种作法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哈贝马斯从为北约轰炸南联盟辩护的《兽性与人性》，到“911”之后他接受德国书业和平奖的演讲《信仰和知识》中，又重新回到了他一贯倡导的对话和交往理性立场上来，认为：“要避免文化战争，就必须对西方自身世俗进程尚未完成的辩证法作一番回顾。‘反恐怖主义的战争’不是战争，何况恐怖主义也显示了不同世界之间灾难性的无语冲突。不同的世界必须在恐怖分子的无声暴力和火箭暴力之外找到一种共同语言。面对消除了市场边界的全球化进程，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希望政治回归另外一种形态，当然不是回到霍布斯式的全球化安全国家的原初形态，即由警察、密探和军队等维护的国家形态，而是回归世界性的文化文明化权力形态。目前，我们除了将空洞的希望寄托于理性智慧和些许自我反省之外别无选择。因为，由失语造成的裂痕也分裂着我们自身的家园。在这方面，只有清醒地认识到世俗化在我们这个后世俗社会中意味着什么，我们才能从容地评估和应对其他社会偏离了轨道的世俗化所带来的种种风险。”哈贝马斯的态度似乎表明了西方世界对此已经有了一种自觉，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等西方学者纷纷来中国访问，这本身就是在寻求一种对话，一种公平公正的对话。

第三，比较文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关于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谈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应该说，比较文学从来都不是纯文学的研究，它都是熔铸了不同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的一种文学研究，在单纯的文学间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背后，实际上都是一种跨文化语境的交流和沟通。但一来过去人们过于重视比较文学的专业技术性研究，而忽视了文化视野；二来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文化研究成为了学术研究中一支劲旅，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所以人们开始注意到文化研究也应成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乐黛云、陈跃红等先生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写《比较文学原理新编》时，就确定了文化研究作为比较文学应有之意的特殊地位，近年来王宁等人更强调了对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应予以更多的关注。然而当人们过分关注文化问题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意义时，在不知不觉中就混淆了两个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研究领域的界限。

我们讲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问题，是强调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时我们的视野和观点，都必须跳出单纯的文学的范畴，而要站在一个大的文化视野上来，而不是要以文化研究来取代比

哈贝马斯：《信仰和知识》，朱丽英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 年第 3 期。

王宁：《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全球本土化”历程及其走向》，载《学术月刊》2006 年第 12 期。

较文学。首先,任何民族文学都是其整个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比较研究不同民族文学,如果离开了对其大的文化背景的把握,就无法很好地把握文学自身。所以比较文学研究应该有一种总体的文化视野。其次,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证明孰优孰劣,而是要达到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识、互证、互补,因而也同样需要一种超越文学自身的文化视野;再次,当今学术范式转型,彻底粉碎了各个传统学科的界限,许多学科、许多学者的研究愈益走向了一种综合化的倾向。比较文学的研究也不能只局限在纯文学性的范围之内,而必须走向一种大的文化视野。本文强调的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宏观视野和大文化背景,这与文化研究或比较文化研究专门以文化问题为对象是不同的。

### 三

关于主体的问题。主体就是研究者。既然比较文学学科的成立标志就是研究主体的定位,主体自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过去人们或者将之和国家、民族定位等同起来,或者把它当作不证自明的东西,其实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关于视域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和主体直接相关的,都是主体的视域,是主体以什么样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进行比较文学研究。脱离主体,就不存在视域问题了。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主体就表现着一种视域,就是在一种独特的视域下来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所以主体就是视域,视域也可以说是主体的视域,二者密不可分,这就是本文题目的由来。

首先,主体不应该仅仅看作一个个体概念,虽然具体研究的人都是以个体形态出现的,比如我们说关于流浪汉小说的研究、关于堂吉珂德原则的研究、关于赵氏孤儿在西方世界的影响等,都是和一个具体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我们还需要看到,任何个人都是属于一个更大的群体,都有他的地域、国家、民族、某种文化精神的规定性,所以主体也是一个群体概念。我们过去所讲的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美国学派、苏俄学派,我们现在反复强调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应该怎样办,都是从群体的角度来谈主体的。作为个体的主体,可以从其共同性上去探索他们的视域,可以不考虑这种视域的差异去谈它的跨越性,前文所谈的视域问题就是把这种群体主体的差异性悬置起来,而就其共同性而言的。但作为群体的主体,其差异性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所谓“西方中心主义”,所谓“文化霸权”,都是由群体主体产生的。

其二,群体主体不能简单等同于国家、民族,更不能作为单纯的某个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声筒,甚至成为某种自我中心主义意识的集合。恰恰相反,这个群体主体正是对自身文化传统和自我中心主义的一种超越。法国汉学家于连·弗朗索瓦在谈到为什么我们研究西方哲学不能绕过中国时说:“‘穿越中国’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是为了‘创造一个远景空间,切断西方人对希腊思想原有的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他说:‘为了再了解和再发现,不得不割断原有的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即从‘远景思维的空间’,从‘他者的外在的观点’,构成对自己的新的认识。”这段话虽然讲的是一种哲学研究的视域,然而其“从远景思维空间,从他者的外在观点,构成对自己的新的认识”的道理,却具有某种普遍性,完全适合对比较文学研究主体的界定,尤其是创造一个远景空间,切断我们原来对自己传统的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说得极其深刻。

这种“切断”,就是一种超越,对简单的民族文化认同观念的超越,对自身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超越,对自我中心主义的超越。没有这种切断,我们就不能摆脱传统的重负而重新认识自身,就会重新翻起“体用”观来粗暴地对待不同文化精神,就会搞所谓“古已有之”的简单实证,就会把比较文学变成某种文化沙文主义的载体;没有这种切断,我们也不能进入一种新的整合,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在不同民族传统的互证、互识、互补的基础上,来实现文化的创造性本质。这

转引自乐黛云《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载《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



才是比较文学的真正目的所在,也是比较文学在新时期所能发挥的真正作用和意义。

其三,以独特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域作为自己的清醒的主体立场。前面所说的种种超越,并非要彻底取消比较文学研究的主体立场,而只是要取消民族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立场,取消孰优孰劣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立场,从而建立起以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独特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域为中心的主体立场。世界各民族、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问题。如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进程,开始面对所谓的后工业社会的种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而中国等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既面临着超越传统的局限,迅速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又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后现代种种问题的影响和困扰。还有各自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宗教信仰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以一种模式来生硬地套在所有国家和民族头上,必然引发地区间的冲突。

中国比较文学从产生的那天开始,就形成了独特的学科意识和问题域。乐黛云指出:“20 世纪伊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却并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学术现象,也不是在学院中产生,它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密切相关,它首先是一种观念、一种眼光、一种视野,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学封闭状态的终结,意味着中国文学开始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学之中,与外国文学开始平等对话。”西方的比较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一种在同质文化领域的文学内部进行的,是一种区域性内部的比较文学,而“中国比较文学一开始就是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比较文学,是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上发生的,它一开始就跨越了区域界限,具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

从 1908 年鲁迅写出了《摩罗诗力说》和王国维《人间词话》公开发表算起,中国的比较文学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而这个学科的真正发展繁荣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虽然在不断变化,从启蒙到救亡,从政治斗争到经济建设,但有一个方面是相同的,即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是一场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人的内心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已经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西方社会成为了我们之外的世界,成为了我们的“他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弱势群体,我们面对的世界则成为了一种强势群体,要改变我们的弱势,就需要改变过去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状况,就需要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大家庭中,于是,学习西方、借鉴西方、研究西方、对照西方,中西文化的互识、互证、互补,中西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内容。这是中国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也是新时期比较文学繁荣的背景。

这个背景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独特的问题域和问题意识,即超越传统的局限、增进中外交流和沟通,实现社会转型。这个问题意识也就是我们独特的主体视域,也就决定了我们不管面对的是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抑或是其他民族的文化,我们进行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问题,而不是面对后工业社会的问题、后现代的问题或者后民族格局的问题。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西方自 20 世纪以来出现的种种文艺思潮和文论体系,诸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等问题,对于西方世界和对于中国具有不同的意义。切不可简单比附,或照猫画虎亦步亦趋,把西方的问题当作我们的问题,把西方世界解决他们面临问题的方式,当作我们必须采纳和吸收的东西全面拿来;也不可过分强调中国与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夸大中西面临的问题的差异,而全面拒绝西方的理论成果。一切都要从我们具体的问题意识出发,客观、公正、理性地对待。

要拆解西方中心主义和话语霸权,倡导文化多元共存。西方社会虽然可以是我们学习和参照的榜样,但不可以照搬照抄,完全效仿。原因在于,西方社会并非完美的现代化模式,从 19 世纪中后期开始学界对理性的质疑到 20 世纪的社会批判思潮,都在检讨启蒙理性对现代性社会

乐黛云:《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载《中国比较文学》2005 年第 9 期。



的设计。阿道尔诺感慨奥斯维辛之后不再有诗,霍克海默认为启蒙的纲领就是要用理性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然而,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理性成了新的神话,哈贝马斯说现代性合法化出现了危机,诸如此类的论述都说明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现代性社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现代世界是一个多极化的时代,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实际上也就是要为自己民族寻找一条生存和发展之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语言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世界文学与文化呈现着一种多声部、多节拍、多变调的大合唱。当然这里面还有矛盾、有冲突、有斗争,但毕竟不是一种声音。随着东欧解体和东西方冷战的结束,特别是全球化趋势,西方话语的霸权意识在一个新的层面更加强了。如果说过去西方世界曾靠船坚炮利和发达的经济来实现其霸权的话,那么现在则是一种话语霸权,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全球一体化”等等,无不带有西方社会形态与文化价值体系独步世界的意味,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

同时,我们也要警惕那种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声音,这同样是一种话语霸权。比如对下个世纪的乐观展望,比如中国文化失语的感慨等等。尤其是许多中外的汉学家对传统文化典籍的现代阐释,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呼声日益增长,都可能产生一种误导,把比较文学重新带入孰优孰劣,或者将来孰优孰劣的简单价值判断之中。所以,反对一元化和话语霸权,倡导多元化,倡导对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予以同等的重视和关注是我们的立场。

我们倡导文化的多元共存并不是说提倡文化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不像西方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所提倡的“怎么都行”,我们是要提倡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文化的碰撞、交流、沟通、融合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文化,当然未必是一种统一的世界文化,但对于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他有了适合于自己发展的新的文化形态和形式。为此,任何文化的霸权都应该被消解,特别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受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响比较严重,把西方文化当作一种我们必须效仿的强势存在,我们经常把西方的理论平移过来,就变成了指导我们学术和文化建设的東西。仿佛我们的发展就是步西方世界的后尘,西方社会中出现的東西,就必然是我们将来要面临的東西。西方有了后现代主义,我们就宣传后现代主义,西方有了新历史主义,我们就宣传新历史主义,完全忽视了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我们自己的主体视域,丧失了中国学者的主体立场,这无疑是应该加以避免的。

(作者单位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元亮

参见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参见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城、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